

沙特阿拉伯王子的性虐殺醜聞

案情回顧(2010年10月)：

一名有同性戀傾向的沙特阿拉伯王子涉嫌為了性目的，在倫敦一間五星級酒店房間內多次毆打被他當作僕人的男性朋友，導致對方腦出血和頸部嚴重受創而死亡。驗屍顯示，死者被勒斃，而且頸骨折斷，有內傷、肋骨骨折、腦出血，左眼腫、唇裂、牙齒脫落，耳朵、背、胸皆有創傷，部分為舊傷。此外，死者臉頰有幾個很深的牙齒痕，具有性含意，驗屍報告還驗出被告內褲有死者血漬，死者的內褲則有被告的精液。

被控性虐殺的沙特王子，宣稱與僕人班達爾是「朋友」，兩人「平起平坐」，但控方指被告一直當對方為僕人、隨從，沒有當他是朋友看待；在乘坐機時，當被告坐商務機艙，死者只能坐經濟客位；晚上睡覺時，被告睡床，死者則通常臥在地板。

在案發當天，酒店升降機的閉路電視片段顯示，案發前王子曾在升降機內對該名男僕拳打腳踢，異常暴戾，這些行為對死者來說已是司空見慣，因為死者三年來對這些行為皆捱打不還手。



此新聞的其中一個焦點是，該沙特阿拉伯王子被懷疑有同性戀傾向。為什麼人會有同性戀的傾向呢？此外，為什麼人會做出性虐殺的行為呢？

心理分析學派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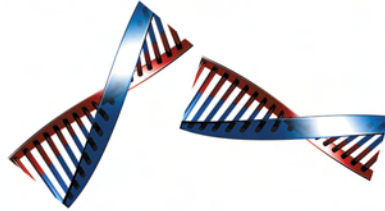
佛洛伊德(S. Freud)的心理分析(Psychodynamic)學派認為，人的同性戀傾向是基於對異性父母的過份認同(Overidentification)。即是，男同性戀者會對母親過份認同而對父親較疏離或敵視，女同性戀者反之亦然。他們的行為會顯得較像異性，如男同性戀者會有女性化的行為。



但是，以上的觀點後來受到不少人的批評，因為同性戀者未必有像異性的行為，而很多人和父母親的關係亦十分良好。



基因



同性戀的另一個原因是基因所致。有研究指出，同卵雙胞胎的性傾向比異卵雙胞胎的為相似。但同時亦有研究指出，近一半的同卵雙胞胎有不同的性傾向。由此可見，基因雖會影響性傾向，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由此可見，性傾向的成因非常複雜，目前我們只可總結，先天因素（如基因）和後天因素（如環境和經驗）相互影響而構成性傾向。

性虐殺是「本能」？！

另外，從心理分析 (Psychodynamic) 的角度來看性虐殺，也能解釋是次案件的發生。根據佛洛伊德的觀點，人有兩類本能，第一類是「求生」或「性的本能」(Life or Sexual instinct)，而第二類是「死亡的本能」(Death instinct)。當展露死亡的本能受到求生的本能阻止時，未抒發的能量會積存在體內，不能發泄。因此，這自我催毀的能量或衝動往往會轉移到別人身上，而形成暴力。佛洛伊德也指出，積存在體內的性 (Sex) 和暴力 (Aggression) 的能量有時是會一起出現的，因此它們會互相混合並形成一種行為，稱為「施虐」(Sadism) (Carver & Scheier, 2008)。



以此案件為例，沙特王子除了性侵犯他的男性朋友外，他亦嚴重地向他的朋友使用暴力並導致死亡，顯示出這兩種能量的結合。



(上述例子推斷純屬學術分析，不能作為事實根據)



近年來，「援交」成為大眾高度關注的青少年問題，當不斷有傳媒揭露年輕少女為買名牌而援交、一部接一部的電影在拍攝「援交」的情況、一本接一本剖析「援交」少女心路歷程的書，都讓我們把自己設身在她們的處境中，體會她們的沮喪、恐懼、愉悅與希望。

警方把「援交」視為必須致力打擊的網上賣淫活動、平等機會委員會等機構相繼調查年青人對「援交」的接受程度……等等，很多的政策看似在幫助這一群年青人，但成效似乎令人質疑。而且問題一個接一個的被揭發，原來除了「援交少女」，「援交男」的問題亦很值得社會關注，就讓我們一起從心理學角度探討「援交男」及其衍生的問題。



首先，讓我們給男性性工作者先下一個定義，男性性工作者 [Male Prostitutes/ Male Sex Workers] 是指男性多次與任何沒有特殊關係的人從事性活動，以此獲得金錢或提供一個或更多生活用品（例如食品，衣物和保護）(Coleman, 1989) 或其他有價值的物品 (Morse, Simon, Ososky, Balson, & Graumer, 1991)。所以「援交男」亦是男性性工作者的一種，他們會在網上討論區或經朋友介紹尋找客源，然後提供性服務以賺取金錢或心靈的慰藉。「援交男」可以是異性戀、同性戀及雙性戀，很多「援交男」服務對象都不只是女性，事實上，他們大部份客人都是男性。

就著男性性工作者這個問題，已有不少學者表示關注，有研究報告指出，男性性工作者往往要面對多個問題，包括離家出走和放棄學業等，導致他們缺乏教育、社交技巧和就業技能 (Coombs, 1974)。酒精和毒品已佔他們生活的大部分 (Morse, Simon, Balson, & Ososky, 1992)，常出現在拘留中心、有犯罪記錄、並針對老年男性的暴力行為（通常是同性戀）已被列為常見的男性性工作者行為 (Coombs, 1974; Visano, 1988)。這些焦點引起了我們對男性性工作者的一些成見，並形成了一個精神病理社會的錯位，使我們把那些從前曾受兒童性虐待的人 (Boyer, 1989) 視為極度渴望金錢的人 (Chappell, 1986)。亦有研究指出，並非所有的男性性工作者都是心理不穩定、極度渴望金錢或處於赤貧 (Aggleton, 1999; Scott, 2003; West & de Villiers, 1993)，而是越來越多從事性工作的人把這視為一種職業選擇和作為合理經濟成果的決定 (Marino, Minichiello, & Disogra, 2003; Minichiello et al., 2001; Thomas, 2000; Weitzer, 2000)，在這些人眼中，性工作只是一種職業，受僱者只是提供性服務換取金錢 (Visano, 1988)。在香港，援交的人也不單來自低下階層，不只低學歷青年，也有大專或大學生。他們面對不穩定或大壓力的工作，在學業和工作的過渡上遇到了不少不如意的事情，都容易令他們氣餒，而走上「援交」的路上。



這幾年來，香港男性性工作者愈來愈多，而男同志社群的愛滋病感染率日漸上升，所以我們要密切關注男性性工作者的問題，除了把男性性工作者預防愛滋病的工作做好，社會亦應花更多資源在探討和了解「援交」這個現象，從問題的最基本層面去處理，這才可以把「援交」問題徹底解決，營造更健康和諧的社會。

如同學想對「援交男」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到「午夜藍」，一個香港男性性工作者互助網絡的民間社團的網頁瀏覽。

失去自己個性(De-individualization)的恐怖!!!

一個性格內向、在朋友面前說話也會害羞的人，竟然會在紅館看演唱會時跟著歌手大聲唱歌；在體育館裏也會跟著別人為運動員吶喊助威。為什麼同一個人在不同環境下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呢？原來當一個人處於群體時，很容易就會把自己的個性收藏起來，心理學家 **Leon Festinger** 等人創造了「去個人化」一詞，來描述個人如何能變得「在團體中隱匿」，當個人意識變得薄弱時，就不會留意到身邊的人在注視自己，覺得可以隨意做自己喜歡的事 (Festinger, 1950 & 1959)。這一種感覺可以創造「內部限制的降低」(Reduction of Inner Restraints)，而引至一些反常的行為。後來另一位心理學家 **Zimbardo** 發現當人需要負的責任減少或消失了的時候，會更容易去個人化 (Zimbardo, 1969)。曾經有一個實驗，詢問兩組男性：「如果強姦是合法的，請問你會不會強姦呢？」結果就是記名的一組大部分人都回答自己不會強姦，而不記名的一組就剛巧相反，大部分人都回答自己會強姦，從而可見失去自己個性的恐怖。當然，在有秩序的社會團體，「去個人化」不會在所有情況下都導至人失去社會性，而且也很難令人做出一些反社會行為。

新莊上任



心理學推廣學會2011年

心理鎖

PsyLock

驚世預言家曾經預測於二零一一年，將有一支懷着滿腔熱誠，誓要將令心理學風靡整個中大的曠世奇莊。另一方面，李慧珍樓102室夜夜燈火通明，裡面的十二個人正密謀於翌年令新奇有趣的心理學知識衝出信和樓，於中大各地遍地開花，並聚集各書院各系的會眾，使心理學風潮席捲校園。這十二個人各懷崇高的理想，向着心目中的目標直奔！心理鎖，將肩負起推廣心理學的責任，為同學們舉辦各樣精彩活動，加油吧！心理鎖！



是次出版蒙香港中文大學心理系曾耀基博士作顧問，特此鳴謝。

Aggleton, P. (1999). *Men who sell sex*. London: UCL Press.

Carver, C. S., & Scheier, M. F. (2008).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ity*. Boston, MA: Pearson.

Chappell, H. (1986). The rent boy scene. *New Society*, 78, 8-9.

Coleman, E.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prostitutional activity among gay and bisexual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7, 131-139.

Coombs, N. (1974). Male prostitution: A psychosocial view of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4(5), 782-789.

Festinger, L. and Carlsmith, L.M. (1959).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203-10.

Festinger, L.S., Schachter, S. and Back, K. (1950). Social Pressures in Informal Groups. New York Harper & Row.

Harris, M. (1973). *The Dilly Boys: Male prostitution in Piccadilly*. London: Croom Helm.

Boyer, D. (1989). Male prostitution and homosexual ident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7(1/2), 151-184.

Morse, E.V., Simon, P. M., Balson, P., & Osofsky, H. (1992). Sexual behavior patterns of customers of male street prostitute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21(3), 347-357.

Nevid, J. S., & Rathus, S. A. (2007). *Psychology and the Challenges of Life (10th ed.)*. John Wiley & Sons, Inc.

Scott, J. (2003). A prostitute's progress: Male prostitution in scientific discourse. *Social Semiotics*, 13, 179-199.

Visano, L. (1988). Generic and generative dimensions of interactionism: Towards the unfolding of critical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Comparative Sociology*, 29(3-4), 230-243.

West, D., & de Villiers, B. (1993). *Male prostitution*. New York: Harrington Park Press.

Mariño, R., Minichiello, V., & Disogra, C. (2003). Male sexworkers in Cordoba, Argentina. *Pa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13), 311-319.

Zimbardo, P. G. (1969).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 In W. J. Arnold and D. Levine (Eds.), 1969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pp. 237-307).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